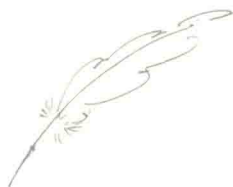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古今从编

刘小枫 ● 主编



[英]托兰德 John Toland 等 ● 著

# 托兰德与激进启蒙

John Toland and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刘小枫 ● 编  
冯庆 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Classici et alii

古今丛编

刘小枫 ● 主编



# 托兰德与激进启蒙

John Toland and 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英]托兰德 John Toland 等 | 著

刘小枫 | 编

冯庆等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托兰德与激进启蒙/刘小枫编;冯庆等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15. 1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8261-5

I. ①托… II. ①刘… ②冯… III. ①托兰德, J. (1670~1722) —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561. 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6968 号

---

## 托兰德与激进启蒙

---

编者 刘小枫  
译者 冯庆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8.5  
字 数 228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2 工程”的支持

## “古今丛编”出版说明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因应与西方政制相遇这一史无前例的重大事件,我国学界诸多有识之士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禀赋和志趣奋力迻译西学典籍,翻译大家辈出。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典籍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和偶然性。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典籍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秩积,至80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尽管这套汉译名著的选题设计受到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开闢后学之功万不容没。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迫切感到必须重新通盘考虑“西学名著”翻译清单,首创“现代西方学术文库”系列。虽然从重新认识西学现代典籍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迻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界侈谈所谓西方文化,实际谈的仅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术传统,尤其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的若干强势国家所代表的“技术文明”,并未涉及西方古学。对西方学术传统中所隐含的古今分裂或古今之争,我国学界迄今未予重视。中国学术传统不绝若线,“国学”与包含古今分裂的“西学”实不可对举,但“国学”与“西学”对举,已经成为我们的习惯——即“五四”新文化运动培育起来的现

## 2 托兰德与激进启蒙

代学术习性:凭据西方现代学术讨伐中国学术传统,无异于挥舞西学断剑切割自家血脉。透过中西之争看到古今之争,进而把古今之争视为现代文教问题的关键,於庚续清末以来我国学界理解西方传统的未竟之业,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自 2003 年起步以来,迄今已出版二百余种,以历代大家或流派为纲目的子系初见规模。经重新调整,“经典与解释”编译规划将以子系为基本格局进一步拓展,本丛编以标举西学古今之别为纲,为学界拓展西学研究视域尽绵薄之力。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经典编译部甲组  
2010 年 7 月

## 编者前言

——托兰德的“自由思想”与双重写作

刘小枫

十七世纪中叶以来,英格兰和爱尔兰出现了一批被称为“自然神论者”(Deists)或“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s)的智识人。他们的著述和文章直接启发并激励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史称启蒙运动的精神教父,托兰德(John Toland, 1670—1722)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简单来讲,自然神论指的是凭靠自然理性来解释宗教,暗中否定在当时具有政治法权的基督教会所具有的启示权威。由于这种新派哲学在当时有违基督教君主政体的政制基础,从而面临政治危险,自然神论者们不得不采用“在神学上撒谎的技艺”(the art of theological lying)——掩饰(dissembling)或伪装(dissimulation)的“显白/隐微”双重写作手法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sup>①</sup>为了让自己的同仁更为自觉地用隐微写作手法与基督教君主政体作斗争,托

---

<sup>①</sup> 参见 D. Berman,《自然神论,不朽与神学上撒谎的艺术》(Deism, Immortality, and the Art of Theological Lying), 刊于 J. A. L. Lemay 编,《自然神论、共济会与启蒙》(Deism, Masonry, and the Enlightenment), Newark 1987, 页 61-78。自然神论的中译文献,参见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陈修斋、曹棉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页 97-145。赵林主编“自然神论译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以降);洛克,《基督教的合理性》,王爱菊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赫伯特,《论真理》,周玄毅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廷得尔,《基督教与创世同龄》,李斯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兰德写下了关于双重写作手法的专论,成为西方文史上最早系统表述这一古典传统的哲学家。通过考察这位洛克的学生、斯威夫特的同时代人关于双重写作手法的论述,本文力图探究近代西方启蒙运动的起源及其与隐微写作的关系。

### 一 “自由思想”与隐微写作

我国学界对托兰德并不陌生,由于他主张唯物论和无神论,史称启蒙思想的先驱。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他的三种要著陆续进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基督教并不神秘》(*Chritianity not Mysterious*)、《泛神论要义》、《给塞伦娜的信》。<sup>①</sup> 不过,尽管这位“自由思想家”以《基督教并不神秘》一书闻名欧洲甚至闻名华夏学界,他所引发的思想史事件仍然笼罩在“神秘”的面纱后面——基督教并不神秘,托兰德却颇为神秘。<sup>②</sup> 至少,我国学界迄今尚未注意到他的论著的写作手法与其所要表达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

托兰德出生在爱尔兰北部的海口城市伦敦德里(Londonderry)的一个天主教家庭,16岁那年改信新教。17岁时,托兰德东渡北海峡到苏格兰上格拉斯哥大学,随后转到爱丁堡大学继续学习。19岁大学毕业后不久,托兰德在一位牧师的资助下到荷兰莱顿大学念了两年研究生。24岁那年,托兰德回到牛津大学继续念研究生,在

---

① 托兰德,《基督教并不神秘》,张继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012;托兰德,《泛神论要义》,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托兰德,《给塞伦娜的信》,陈启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下引托兰德这三部作品,均随文注页码。

②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托兰德就随着我国学界对“思想自由”的引介而进入中国。参见柏雷,《思想自由史》,罗志希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1934;樊炳清编,《哲学辞典》,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1935。托兰德生平参见《基督教并不神秘》中译本(2012)所附《托兰德生平和著作年表》。

此期间动笔写《基督教并不神秘》。这本小册子正式出版那年(1696),托兰德年方26岁,其才学让欧洲学界惊讶。

《基督教并不神秘》说的是,《圣经》的教诲并没有包含什么难以理解的启示奥秘,凭靠经过适当训练的理性,所有的信仰教条不仅都可以理解,而且可以按自然原理对启示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用自然理性来解释基督教信仰,在今天看来似乎自然而然,在当时却是严重的政治事件。因为,这种解释实际上否定了基督教信仰的启示来源,彻底抽掉了基督教信仰的根基。

《基督教并不神秘》出版的前一年,哲学家洛克在伦敦出版的《基督教的合理性》就已经用自然理性来解释基督教信仰。由于担心会招致宗教罪,洛克在出版这本书时用的是匿名。不过,《基督教的合理性》至少从书名来看并不会惹祸,因为,说基督教信仰合乎理性,不等于否认基督信仰具有启示性质。然而,由于《基督教的合理性》实际上否认了基督信仰的启示性质,我们就可以说,洛克采用的是显白/隐微写作手法来否定基督教信义的启示来源:表面上说基督教信仰合乎理性,是显白(可以公开)的说辞,实际上说基督教信仰不合乎理性,则是隐微(不可以公开)的说辞。事实上,通过自己对人的自然理性的研究,洛克已经把自然理性确立为衡量宗教的真理是否为真的依据,宗教的启示权威就已经被自然理性的权威取代了。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提出了著名的符合或不符合理性的宗教真理的区分,尽管这种区分承认不符合理性的宗教真理属于宗教的启示奥秘部分,实际上已经建立起用哲学的理性来评判宗教奥秘的思想法权。<sup>①</sup>既然用于认识自然界的科学方法对于认识存在的一切领域都具有绝对的合理性,科学的自然知识是衡量一切的尺度,或者说,可以被感觉观察的东西,才是实在的或者可信赖并可证明的东西,那么,哲学家的自然理性才是判定世上所有真理的最

---

<sup>①</sup> 参见洛克,《人类理解论》,关文运译,第18章“信仰和理性以及其各自的范围”,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页688-696。

终权威。

托兰德的《基督教并不神秘》的书名看起来与洛克的书名相似：“不神秘”的意思似乎就是合乎理性。然而，读过此书的读者都会看到，托兰德的意思与洛克一样：基督教信义并不符合理性。托兰德知道自己的书会惹祸，因此出版时用的也是匿名，以至于有人还猜测是洛克写的。《基督教并不神秘》出版后的第二年（1697），爱尔兰议会便宣布此书为坏书，下令焚毁并追究作者的刑事责任。托兰德逃往伦敦，索性用本名再版《基督教并不神秘》，随即爆得大名，有读书人因此称他为 Freethinker。于是，托兰德成为欧洲文化史上第一个被称为“自由思想者”的学人——可以说，“自由思想者”这个语词是因托兰德而发明的。

这一思想史事件对于我们认识启蒙运动的起源具有重大意义。首先，与今天的含义或用法不同，所谓“自由思想”这个语词在当时是“异端思想”的代名词，而所谓“异端”是相对于基督教信仰的正统教义而言的。第二，所谓“自由思想者”特指的是具有唯物论观念的哲学家——由于唯物论主张无神论，“自由地思想”等于“无神”地思想。第三，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如此思想，因为，如此思想需要具有哲学的思辨能力——即便在今天，能看懂洛克《人类理解论》的大学生，在西方也并不多。按著名思想史家沃格林的看法，洛克心底里对启示的真理虽无敬意毕竟还装得来有敬意，托兰德在“根本之处上”与洛克一致，但“思想更激进”，对基督宗教“更缺乏敬意”。他发展了洛克的思想，而且结论更直截了当，用哲学的理性来反对所有宗教。托兰德所“迈出的关键性一步”就“内在于洛克的观点所具有的逻辑中”——这一步就是：真正地开始“自由思想”。<sup>①</sup>

总之，所谓“自由思想”在当时特指新派哲学家的“思想”不受

---

<sup>①</sup> 沃格林，《革命与新科学》，谢育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页211-215。

基督教会法权管辖,而“思想”(think)的具体含义则是指唯物论式的哲学思考。这种思考并非近代哲人的发明,而是来自古希腊的自然哲人,尤其德谟克利特以及随后的伊壁鸠鲁学派。所谓“自然神论者”称之为现代自然哲人更容易理解。唯物论与无神论几乎就是同义词——既然相信物质才是世界的本源,就不会相信上帝的创世论。在欧洲,君主政体与基督教会 在政制上一体,唯物论者攻击基督教会的信仰根基,自然也就是政治事件。《基督教并不神秘》出版后的第三年(1698),英国政府颁布《渎神法案》(Blasphemy Act),禁止违背《圣经》和诋毁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的论说,违者逮捕法办。这个法案与1662年的《出版法案》(Press Licensing Act)相呼应,构成了对所谓“思想自由”的“钳制”。如今,我们对“思想自由”的理解已经非常之宽泛,以至于会忽略这样一个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政治共同体中的每个人是否都能够通过哲学教育变得爱好思辨、进而获得哲学的思辨能力?要求每个人都具有哲学的世界观,就需要推行普遍的哲学教育——这就是启蒙的原初含义。如果少数具有哲学观念的人的这一愿望能够实现,就会出现一个普遍理性的政治社会,亦即用自然理性取代宗教信仰施行统治的社会。然而,如果实际上政治共同体中的大多数人受自己的天性所限不能够获得哲学理性的思辨能力,那么,社会秩序尤其社会的道德秩序的失序就不可避免,因为,宗教对人心的道德秩序的统治法权已经被哲学启蒙废除。

由此来看,自然哲人的“自由思想”的反面是受到禁锢或“钳制”的思想。我们必须问:受到谁的禁锢或“钳制”?从教科书上可以找到的答案是:受到教会的政治法权的禁锢或“钳制”。然而,这个答案事实上并不充分。严格来讲,“自由思想”更多受到的是人民大众的禁锢或“钳制”,因为,人民大众并不“信”自然哲学,而是“信”宗教——托兰德关于双重写作手法的著名论述证明了这一点。在50岁那年,托兰德出版了《四论集》(*Tetradymus*,1720,迄今尚无中译本)。这部书由四篇文章构成,题为《掌管钥匙的人》(Cli-

dophorus)的第二篇专论显白与隐微教海的区分。<sup>①</sup> 文章标题很长:

或关于显白与隐微哲学;亦即关于古人的对外和对内教义:对外教义是公开、公共的,适应俗众偏见和靠法律建立起来的宗教;对内的教义是私下且秘密的,适应极少数有能力且低调的人,教给他们褪去了所有掩饰的实在的真理。<sup>②</sup>

可见,“极少数”自然哲人的思想的对立面是“俗众偏见”(popular prejudices),而“俗众偏见”与“靠法律建立起来的宗教”(the Religions established by Law)被看作是一回事。这无异于说,“俗众偏见”具有政治法权,从而具有禁锢或“钳制”“极少数”自然哲人的“思想自由”的力量。正是由于担心受到“俗众偏见和靠法律建立起来的宗教”的迫害,托兰德在这篇文章一开始就说:

知道真理是一回事,告诉他人真理是另一回事: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钦慕真理,同时则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即,他本可以告诉别人真理,却没有告诉。(《掌管钥匙的人》,页63,冯庆译文,下同)

按托兰德的说法,“知道真理”的人是少数“天性热爱真理之人”(to be naturally fond of Truth),他们热爱真理胜于热爱财富或名声,不懒惰却不忙碌于俗事,而且不畏权威贵胄……这类“知道真理”的人指的就是自然神论者,因为他们知道的“真理”是关于自然本相的“真理”。比如,世界是由物质构成的,而非上帝造出来的。这种人并不把自己知道的“真理”告诉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托

---

<sup>①</sup> John Toland, *Tetradymus*, London 1720/Kessinger Publishing 2009(影印版)。全书由一篇序言(Preface)和四篇文章构成,文章均有双重标题(拉丁文标题和英文标题)。

<sup>②</sup> 《掌管钥匙的人》全文共分11节,中译文见本书,凡下引该文一律随文注 *Tetradymus*(2009影印版)页码。

兰德随之就说,还有另一类“知道真理”的人,他们是些“谲诈之徒”(cunning persons),宣称自己“可以将真理透露给其他人”,其实这不过是“统治他人的最好方式”。

他们自吹自擂,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至高的超自然的知识(a superior and supernatural knowledge),[这种知识]不受[理性]批判的规则(rules of criticism)约束,也不是一个恰切的理解对象(a proper object of the Understanding)。不但如此,他们还走得更远,公然宣称为了公共利益而撒谎是合法的;因为普通人(如他们所言)并不具备反思能力,应被谎言所治,被动听的神话故事(Fables)诳骗,进而顺从他们的统治者(Governors)。(《掌管钥匙的人》,页64)

显然,这里指的是各种宗教的教士,他们知道的“真理”与自然哲人所知道的“真理”不是同一个“真理”。自然哲人所知道的“真理”是凭靠自然理性的批判规则得来的,宗教教士所宣扬的“真理”是所谓“至高的超自然的知识”,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真理,这种“真理”经不起理性批判规则的检验。然而,托兰德说,各种宗教的教士都不过是些“诡计多端的江湖骗子(Empirics)”,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所言不实、所论非理,早晚会被有识之士揭发(detected by men of penetration)”。可是,托兰德也知道,这类“江湖骗子”之所以要用“至高的超自然的知识”骗人民大众,是因为他们认为,“普通人(the common people)并不具备反思能力(being incapable of reflection)”。从而,他们自认为用“谎言”统治人民不仅“合法”(lawful),而且是“为了公共利益”(for public good)。换言之,作为现代的自然哲人,托兰德认为,“普通人并不具备反思能力”并非自然现象,而是作为教士的“江湖骗子”施行统治的结果。既然如此,自然哲人作为“有识之士揭发”“江湖骗子”的谎言,推行哲学的启蒙教育让普通人具备反思能力,才是真正的“合法”和“为了公共利益”——这就是自然哲人推行哲学启蒙的理据。

托兰德在文中所说的“江湖骗子”首先指的不是一般的教士阶层,而是人类史上各种文明宗教的创制者。他首先提到的是“一位名叫姆内维斯(Mnevis)的埃及国王”,他“通过佯装具有与上天沟通的至高权力来使其臣民服从”。然后,托兰德罗列了古波斯的琐罗亚斯特(Zoroaster)、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米诺斯(Minos),古罗马的努马(Numa),古中国的伏羲(Fohi)、古印度的佛陀,一直罗列到穆罕默德和成吉思汗……(同上,页65)。这样一来,所有传统文明的宗教创制人都成了自然哲人的天然敌人。在基督教政制的语境中,托兰德把所有这些古典文明宗教的创制者说成“骗子”不会惹来政治麻烦,因为他们都是所谓“异教”的创制者。托兰德并没有提到耶稣,显然,如果他说拿撒勒人耶稣也是这样的人,就会招致政治罪。然而,在这段列举的最后,托兰德说,

西西里的狄奥多儒斯(Diodorus Siculus)以及其他古典作家并不畏惧将摩西与这些人相提并论,尽管摩西的律法是真正神圣的,其中未含半点缺陷与愚昧。(同上,页65)

托兰德巧妙地假托古史家狄奥多儒斯之口说,摩西就是这样的人,无异于在暗示耶稣也是这样的“骗子”——这就是托兰德的隐微笔法。接下来托兰德就说到自然哲人与人类史上所有文明宗教的创制者在生存论上的紧张关系:文明宗教的创制者们为了凭靠“谎言”来统治人民,就必须建立专制统治——在这种具有神性外衣的专制统治下,自然哲人要宣传自然的真理就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有人觉察到,建立在谎言之上的东西只能用暴力来支撑,进而要把质疑他们教诲的人判以重罪,极尽污蔑之能事来对待那些仅仅只是验证、更不用说怀疑他们观点的人。教士阶层(Priests)出于自身利益,总是在推行这种惩戒的法律;地方官员们(一方面由于无知造成的迷信,一方面由于在教士阶层的

煽动下想要通过制度[Policy]来攫取更多的法律允许范围之外的权力)则总是期待着以所谓“健康的严刑峻法”的名义来让那些法律生效。因此,对真理的宣传变得毫无立锥之地,除非牺牲一个人的性命,或至少他的荣誉和职位。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同上,页65)

这样一来,追求自然真理的自然哲人们的生存处境自然而然就非常之危险。由此托兰德引出了双重写作手法的必要性:

因此,大多数民族的哲人和其他对人类有美好憧憬之人都受到这种神圣专制(holy tyranny)的钳制,不得不采用一种双重教谕:其中一层是通俗的,与俗众的偏见和既有的习俗或宗教相协调;另一种则是哲学的,与事物的本性一致,进而与真理相符。他们将大门紧紧关闭,在层层安全措施之下,只同公认正直、审慎且贤能的朋友交流。他们一般称这种双重教谕为“显白”和“隐微”,抑或“对外的学说”和“对内的学说”。他们采用的这一区分,以及他们通过这一区分采取的实践行动,正是我现在即将阐明的东西(亦即本文的主题)……(《掌管钥匙的人》,页65-66)

用今天的表达式来说,双重教谕是自然哲人应对政治迫害的双重写作“技艺”。如今所说的“专制”,托兰德用的是tyranny(僭政),这无异于说,文明宗教的创制者们建立的政制是非法统治。在这种政制治下,凡用理性质疑、验证“他们的教诲的人都被判以重罪”,“对真理的宣传变得毫无立锥之地”。既然“大多数民族的哲人和其他对人类有美好憧憬之人都受到这种神圣专制的钳制”,除非牺牲自己的“性命”,他们无法坚持自己的哲学“真理”,他们就只有关起门来探究自然的真理,只与“正直、审慎且贤能的朋友交流”。在《掌管钥匙的人》的随后十节中,托兰德以令人赞叹的古典学功夫,引述大量古典作家关于双重教谕的说法来证明自己关于双重写作



艺术的观点。

按托兰德的论述,古典作家采用双重写作手法仅仅是因为,如果他们公开讲出自己知道的关于自然真相的哲学真理就会招致政治迫害,甚至丢掉性命。托兰德的说法是否符合古典作家有关双重教谕的说法本身,需要另外来讨论,这里我们仅需要进一步理解托兰德的主张。不妨设想,如果能够彻底改变古典文明宗教的政制,建立起一个以“自由”和“宽容”为原则的政治社会,就可以从政制上废除“神圣的专制”对哲学的思想自由的钳制,宣传自然哲学的真理就会不再受到迫害,“显白”[对外]教诲与“隐微”[对内]教诲的区分也就没有必要了。托兰德是否曾这样设想呢?如果他曾这样设想,那么,他就已经与古典哲人的教诲相违。因为,古典哲人认为,关于自然的哲学真理只能关起门来与“正直、审慎且贤能的朋友交流”。

## 二 隐微笔法与启蒙

在托兰德的时代还谈不上哲学思考的“思想自由”的表达。但在任何时代,无论如何严厉的政制其实都无法“钳制”一个哲人自由地沉思自然的本相。关键在于,自然哲人是否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沉思结果。在《掌管钥匙的人》一文中,托兰德告诫自己的同仁,必须采用隐微写作手法来表达自然哲学的自由思想。然而,就在写下《掌管钥匙的人》的同一年(1720),托兰德还写了《泛神论要义》(*Pantheisticon*),这本小册子堪称一份政治文件。从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托兰德并不认为关于自然的哲学真理应该关起门来仅仅与“正直、审慎且贤能的朋友交流”。自然哲人应该建立一个秘密政治组织,他把这个组织命名为 Socratic - Society [苏格拉底协会],从事对外公开宣传自然哲学,以便最终建立起一个理性化的“公民社会”。

《泛神论要义》的副题是 The Form of Celebrating the Socratic -